

精确纪年与文明发达程度无关



学林漫步
□ 新垣平

传统认为,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列传》中由共和元年始,编排到春秋末年,再继以战国秦汉的年表,写到司马迁本人的时代,此后二十四史相继,没有任何间隙地延续到今天。

司马迁还掌握了一些更早的材料,他在共和元年一栏中注明了各诸侯国的国君纪年,比如是年为鲁真公十四年,可以推出鲁真公即位于前854年。事实上,因为鲁国世系记载详尽,可以前推到前997年鲁考公的即位。另外在《周本纪》里,司马迁清楚地记载“国人暴动”发生于周厉王三十七年,下面

紧接着讲改元共和,如果同一年改元的话,周厉王当即位于公元前877年。不过在此之前的四代周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都没有记载在位年份,学者推测当时发生了王室政变,局势相当混乱。中间一断掉,以传统的方法就很难再往上推算了。

岳南在《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中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务委员宋健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发现古代两河和埃及文明的许多王朝纪年都远比中国古老,如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位年份为前1792—1750年,埃及法老胡夫统治时间为前2589—2566年,比中国的最早纪年早一两千零之多。

不过,埃及和两河古文明的确切纪年(绝对年代)并没有十分古老,从绝对的确切性来说,不见得超过中国多少。

以埃及为例,最早的埃及历史传记记录来自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马涅托用希腊文撰写的《埃及史》。马涅托的时代埃及文明早已衰落,不久后,连象形文字都失传了。两千年后,随着象形文字的破译,埃及学的兴起,学者才通过对大量碑铭、纸草书等原始文献的解读,重新梳理埃及的年代。埃及学中有多种年表,比如“传统埃及年表”“修正年表”“新年表”等等。即便在最主流的传统年表中,年代差异也非常巨大。以胡夫为例,20世纪初的埃及学权威詹姆斯·布里斯泰德定其在位年份为前2900—2873年,21世纪的《剑桥古代埃及史》则移到前2589—2566年,差了三百年以上。

埃及人虽然很早就发明了文字,但没有连续的史官传统,王表、铭文等语焉不详,很容易被误读。埃及历史上绝无争议的年份,恐怕得到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征服的那一年。

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与埃及类似,不过精确度略胜一筹。公元前2000年以前,很难确定具体年代,此后历史记录逐渐丰富翔实,但是在前1500年左右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所灭,历史记载发生了巨大断裂,导致此前一切年代都只能估算,因为当时有金星位置的天文学记录,让现代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天文学知识估算一些重要事件的年份,不过因为天体运动是按一定周期循环的,从而每种估算都有64年左右的差距,导致长年表、中年表、短年表等四五种主要模型。

在断裂时期以后,历史记录变得精确多了,但是仍然有数年的差异,威尔·兰格主编的《世界史编年手册》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史事顺序,上溯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其误差不出两三年。”不过也很难说纪年什么时候从相对准确过渡到绝对准确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节点是公元前763年的一次日食,正是这次日食可以让学者通过一系列铭文和残篇,上推到数百年前,而这已经是春秋初期了。

事实上,能否确定绝对年代,与文明的古老或发达与否没有必然关系。不过早期多有模糊中断,准确纪年只能从某一较晚时代开始,是各古文明共有的问题。

(摘自《南方周末》)

人生感悟
□ 王金东

老妈又摔倒了,这一次是在家里,后腰撞在了不硬的沙发角上。距离上一次摔倒不足半年,那是在外面,居然自己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挪了回来。再早的记录是回家后被发现脸上有擦伤,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全过程,拍了核磁共振片显示硬脑膜下血肿才证实了此前的可怕经历。住院后没有任何症状,血肿就神秘地消失了……老妈今年虚岁89。

老妈是个硬人,命硬,用她自己的话说叫刚强。十来岁时得了有记忆以来的首次

体系。我也成了她嘴里的“屁医生”。

之后的经历好像不断地验证她的理念,她口重,但血压不高且偏低,喜欢清淡和刺菜却身材丰满无“三高”,明显的家族性因素导致她家多人死于消化系统疾病,只有老妈安然进入八十行列,而且独居自理。传奇的历程让她更加自负,来自我这个家庭医生所有建议几乎都被拒绝。一直到最后一次的“肚子疼”把她强行紧急送到医院,她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却是让我们把她悄悄准备的“送老衣服”带到医院,那一年她81岁。

这一次,医生分两次从老妈的胆囊和肝管儿里掏出了一堆困扰了她一生的石头,神秘事到此水落石出。在医生和我们子女惊叹于老妈高龄手术史时,老妈再次硬逼出



史海钩沉
□ 刘永加

现在冬季取暖用暖气和空调就解决了,那么四百年前的北京怎么取暖呢?那时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首都,人口最多时达到百万之众,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大都市。如此多的人口聚居,燃料供应自然就是大问题,尤其是冬季取暖用料问题尤为突出。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燃料居第一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北京作为京师,仅皇宫及各衙门、厂库所需的燃料数量就很大。其中内廷耗用柴薪的数量最多,明弘治以前大约是每年2000余万斤。

为了保证北京皇宫及各衙门所需的巨额柴薪,官方选择了林木较多的太行山北段,于宣德四年设立了易州柴炭厂,当时称“山厂”,派专人管理柴炭的采烧。山厂衙门最初设在保定府易州,柴炭也多在

老妈的病与命

疾病:肚子疼。因为贫困,她尝试过医学之外所有可以穷尽的民间方法。扎针、放血、“仙药”、香灰,以及喝酒、抽烟止痛,最后也不知道何种疗法显灵,仅留下吸烟的历史作为可考证据。

老妈的疾病史在我眼里只是极少数“白天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直到我上大的时候,老妈躺在了我们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传说中的“肚子疼”终于再现了,不过几经周折也没搞明白这个神秘来去的病魔咋回事。这是老妈第一次与现代医学亲密接触,虽然“肚子疼”此后很久不再发作,但老妈再也不相信任何疾病理论,坚定地认同了命运

发了。拐杖和搀扶被看成冒犯,常规的医学建议被看成是对她生命活动的束缚。于是就有了前面叙述的系列跌伤史。在我们心惊肉跳中,每次伤后的检查结论居然都无大碍。

在被现代医学征服后,老妈再也没有住过院,每天步行若干小时,践行着“白天决不在床上”的理念。

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老妈依然保留的抽烟习惯、努力自理,仿佛戴在头顶的命运桂冠。我知道老妈病与命的下一个抗争又开始了,可我猜不出她还有几个回合。

(摘自《深圳特区报》)

文化记忆
□ 呼延云

电影里的老北京华灯初上,满城通明,太液莲灯碧熠熠,天街夜色望层层。但事实上呢?

旧京有顺口溜:“黑灯瞎火北京城,终年难见放光明。店铺家家上门板,住户户户光弱如萤。常见大官家灯亮,怀楼小妈正调情。”

这是京城“夜景”的真实写照。京城百姓在明清几百年的时间里,照明靠的是蜡烛和油灯,电力照明直到19世纪末才在宫廷、御园和东交民巷使馆区出现。据统计,直到1909年,仅有600多户官员的住宅上了电灯。

其时北京的路灯分成两种,一种是用了很长时间的烧煤油的纱罩灯;另一种是电灯,主要安装在有限的几条干道上,但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些电灯竟还不如纱罩灯受市民欢迎,它们另有一个外号叫蒿子灯,蒿子灯

是北京的小孩子在七月十五中元节那天,用香火头粘在蒿子上的一种风俗,毕竟是鬼节的物件,其亮度可想而知,跟萤火虫的屁股差不多,整个京城入夜后指着这种灯照明,完全不靠谱。《益世报》评论说:“北京的电灯,跟家里留人吃饭一个样,添人不添饭,饱不饱就是他。”

1922年,石景山电厂建成发电,对京城电力照明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其后日本侵华,虽然在门头沟建设了很多电厂,但多半用于电力采煤以掠夺我国煤矿资源,反而造成内城的用电紧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员主持的冀北电力公司,起先还能正常供电,后来从三天两停电,一日三停电逐渐到日夜都停电。

电力资源的匮乏,必然导致市民生活的匮乏,在描写旧京的文字里,常见的夜景也多是胡同口的丧家之犬,路灯下的几处人影,但在少数几条商业街上,依然可以见到灯火通明的胜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后门大街与前门大街。

后门即地安门,清代这里是正黄旗



和镶黄旗的驻地,一些年老出宫的太监就居住在钟楼后边的娘娘庙里,这些人有钱,讲吃讲穿讲派头,所以想赚他们钱的生意人都争先恐后地在这条街上开商铺,朱光潜先生在1936年写的散文《后门大街》上有这样的回忆文字:“一到了上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百支烛光的电灯,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家家洋货铺门上都张着无线电的大喇叭,放送京戏数书相声和说不尽的许多其他热闹玩艺儿。这时候后门大街就变成人山人海,左也是人,右也是人,各种各样的人。”

相比之下,前门大街要更加热闹。白天大街两侧的行人便道,现在都支起了长龙似的货摊,既繁荣了市民的夜生活,又解决了一部分贫苦人的就业,很受大众的欢迎。只不过这种夜市所售卖之物,质量实在堪忧:比如一件倒得挺漂亮的大衣,买回去仔细一瞧,下摆或者腋窝那不起眼的地方,有个大窟窿,是用一块相近颜色的布补的,补还是不用针线而是用糨糊贴的;更可气的是皮鞋,铝光油亮的一双,到家一穿,不是前面开了嘴儿就是鞋帮裂了口儿,纯粹的坑人蒙事。

(摘自《北京晚报》)

老北京的「夜景模式」什么样



科技视野

科技视野
□ 路琦

去年夏天北极圈内出现罕见高温,一度达到32℃。还记得刚刚过去的冬天北京雾霾频发,仅去年11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就出现4次重污染天气过程。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件,却被科学家找到了其中的关联。

3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赵传峰等发表在《气候动力学》上的一篇研究论文告诉我们,北极与雾霾竟是“相爱相杀”的一对。

通常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了极地变暖。当这一常识被固化后,很少有人会去想,在温室气体外,还有什么物质会让北极变暖。2006年,还在美国犹他大学读博士的赵传峰,首次发现极地地区除温室气体外的另一个导致变暖的重要因素就是气溶胶(霾),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上。回到北师大后,赵传峰又进一步深化了这项研究,揭示了霾气溶胶对北半球冬季的强增暖效应,相关成果2015年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通讯》。

“北极的云层浅薄,地球热量辐射出来的长波透过云层辐射出去后,地球表面温度本应该低一些。然而,霾这种小粒子气溶胶的出现,使得云滴增多、粒径变小、光学厚度增加,地面长波很少能够透过云

没想到吧,雾霾还跟北极有关

层向外辐射,反而被云层保留在地面大气之中,形成了很好的保暖效果。”赵传峰解释。

赵传峰开始琢磨:霾对北极增温有影响,那么反过来,北极变暖后会有什么影响呢?会不会影响大尺度环流,进而影响中纬度地区的雾霾?研究发现,中纬度风场受北极环流的影响,北极变暖后,极地的风圈闭环环流不容易被强风打破,因此中纬度地区来自北方的风速就会减小,不利于污染物扩散。至于影响的滞后性,他认为,是因为能量有一个存储过程。到了夏天,北极海冰融化,海温升高,能量存储到海洋里,到了冬天才会释放出来。

3位匿名审稿人对赵传峰等关于北极增温和中纬度污染之间存在遥相关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该研究的方法新颖,更重要的是,能够引起大家对大尺度环流对局地空气质量影响的共鸣。

“在排放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的这项研究是可以作为预警的。”赵传峰说。他表示,我国雾霾成因复杂多样,各个因素在雾霾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有“贡献”,是各个因子纠缠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到每个过程,雾霾主导影响因素或有差异。赵传峰指出,治理雾霾的最佳手段永远是源头开展治理。

(摘自《中国科学报》)

明代一场能源和生态危机

易州沙谷等山厂开采,但自宣德五年(1431年)起,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取用已久,材木既尽”,于是在景泰元年(1450年)初,移厂到真定府平山、灵寿等处采烧。后来考虑路途遥远,怕影响京师供应,到天顺元年(1457年),再次把山厂移回易州城西二里的地方。

山厂隶属于工部,工部在山厂建有部堂,设管理侍郎一员总管其事。在山厂劳动的人役称为砍柴夫,宣德四年出派砍柴夫的府州有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及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汾州五州,直隶顺天、真定、保定三府,山东兖州、青州、东昌、济南四府,负责派出采柴烧炭任务的人员,所辖砍柴夫的名额,由上述单位分派,这些府州共金差砍柴夫,合计每季25855名,四季共103420名。这些府州以及所属出派砍柴夫的州县,都要派有佐贰官长驻山厂督理此事。此外,还有运送柴炭赴京的抬柴夫,共有2000名。

木材的消耗量大增,致使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明初以后,北京居民的燃料仍以柴薪和木炭为主,而这些燃料主要来自北京附近的军都山、燕山及太行山。樵采者为了在一处多获取些木柴,往往拔本而取,采之无节,恣意砍伐,给山林造成很大破坏。这其中盗伐山林的现象十分

严重,而盗伐更是破坏性的砍伐。过度的樵采,到明代中叶,北京附近的森林资源已遭到很大破坏。这些山林原本森林茂密,明代中叶以后林木日渐稀少,随之产生了几方面的恶果。

北京居民用煤作燃料,从辽金时代就开始了,到了元代也偶有使用,只是未普及。自明初以后,明政府对北京附近采矿颁布禁令,规定不得于卢沟桥以东山岭挖掘山石和采煤。嘉靖年间,也是因为燃料危机,曾放松控制,尤其是西山的采煤得到许可。此举虽然解决了北京的燃料供应,但因征税问题引发了矿工、煤户大规模进京请愿的风潮。

(摘自《北京日报》)



网海观潮

网海观潮
□ 朱娟娟

众号平台发起了这一投票。截至发稿时,688935人参与了投票。其中,56%认为能独自乘车;44%认为不能独自乘车。

持支持意见的观点中,接近一半的人认为,与其限制乘车人,不如加强司机管理;另外,未成年人能独自坐出租车,就能坐网约车;16岁可以外出打工,当然可以独自乘车。持反对意见的观点中,排名第一的是,安全再完备也防不住临时起意犯罪;其次,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弱,不宜独自打车;监护人必须对未成年人的安全负责。

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产品的边界,近年一直备受关注。在邀请投票页面,滴滴出行列举了几个典型案例。

14岁的周同学打车去火车站,司机师傅见他孤身一人,询问后得知其与家人吵架后离家出走,师傅将周同学送至附近派出所;王女士为13岁女儿代叫车,并嘱咐女儿一定要坐在后排,途中,司机要求女生坐到副驾驶,并对她进行性骚扰,王女士得知后报警,平台配合警方抓获司机,司机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2018年10月18日,滴滴出行App增加“请勿让未成年人独自乘车”的提醒与确认环节。针对未成年人常去的热点区域,如幼儿园、学校,乘客发单前需手动勾选是否成年,如乘车人未成年,需由监护人陪同才可叫车。滴滴出行表示,针对未成年人安全出行

的提醒上线后,得到不少家长的认可,但也有部分家长与未成年人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

2019年1月1日至1月31日,该平台共接到1058个电话问询“为何未成年人无法独自叫车”。其中既有独自去补习的高中生,也有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的青少年,以16岁至18岁为主。在刚刚过去的寒假期间,帮助孩子代叫车,让孩子独自乘车的家长也有所增加。

投票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部分网友提出,未成年人可以独自乘坐出租车,为何不能独自乘坐网约车?网约车的安全性是否比出租车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服务过程中犯罪情况》显示,2017年传统出租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0.627,网约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0.048,前者是后者的13倍。也有网友认为,对未成年人能否单独坐网

未成年人能否独乘网约车

约车不能“一刀切”,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一是可以按照不同年龄层区分对待;二是呼吁建立未成年人独自乘坐网约车“独立的保障体系”。滴滴出行表示,讨论的结果与观点,将为滴滴平台治理和安全产品团队提供重要参考。

(摘自中青网)

